

“经济人”的社会性*

——对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的反思

董志强

摘要：本文从个体的“社会性”出发，结合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的当代思想和证据，反思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上的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体系。社会性是对个体理性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个体有可能偏离物质利益最大化，但是却使得社会合作秩序成为可能。若个体完全理性，反倒有可能摧毁社会秩序；完全由“经济人”组成的市场经济并不能良好运行，或者可能陷入低效率均衡。个体的社会性，使得经济学有必要从关注“市场”一个维度向“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转变，从关注经济均衡转向关注社会均衡。而防止社会失衡，使得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不平等”将成为“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中心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经济人 社会偏好 行为和演化范式 市场经济 道德经济

本文对“经济人”以及建基于此的瓦尔拉斯范式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与常见的批评“经济人”过于理性或过于物质的动机不同，本文引入“社会性”（sociality）概念，结合当代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的思想和证据，来阐明个体的“社会性”不应被经济学忽视。当然，从社会的维度或视角针对理性人假设及其理论推理的批判性反思也由来已久，绝佳的中文素材比如斯梅尔瑟（1989）、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2009）等经济社会学著作，其中充满真知灼见。但我们仍与他们有所不同，本文的视角仍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董志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邮政编码：510006，电子信箱：dongzhiqiang@m.scnu.edu.cn。

*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演化和行为视角的动态产权博弈实验研究”（批准号：71973048）和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2019年）资助，感谢周业安、刘志铭、刘业进的有益评论和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文责自负。

的，并结合了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理论。

所谓“社会性”，是一个抽象而广泛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它是社会中的鲁滨逊所具有的而荒岛上的鲁滨逊所不具有的那些人性。荒岛上的鲁滨逊无所谓道德动机、公平观念，也谈不上对他人的忠诚、嫉妒、内疚和善行恶意；而这些在社会中的鲁滨逊身上都必然具有。对“社会性”较为实用而狭窄的理解，也可以将其视为，个体的道德动机和社会偏好；个体的偏好具有情景依赖性质，特别是根据社会情景考虑自身行为是否得体或合乎时宜，无论这种考虑是出自无意识的本能还是有意识的算计。

在本文中我并不想纠缠于“社会性”概念的广狭，而是试图指出，个体的“社会性”是对其理性的限制。如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①所言，理性的边界不是非理性，而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性（金蒂斯，2011：179）。个体的有限理性或社会性，有助于成就社会秩序；相反，如果个体具有完全理性，社会将无法达成有效合作，难以产生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也就难以形成秩序。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扩展合作秩序，在完全由“经济人”构成的世界中是难以有效运行的；而一旦考虑个体的社会性，市场经济要么不存在竞争均衡，要么很容易陷入多重均衡中的低效率均衡。真实的人类不只有经济生活，也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学必须面对这样的真实世界。故只关注“市场”一个维度的瓦尔拉斯经济学体系存在缺陷，有必要构建“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从防止社会失衡来说，主流经济学所忽视或轻视的不平等问题，将是“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最中心的问题之一。

一、脱离现实的虚构“经济人”

瓦尔拉斯范式主流经济学假设个人偏好是单一的，但真实的个人偏好是多元的。理性“经济人”以最大化自身物质利益为唯一行动目标，“自利”是其最纯粹的标签。但最近半个世纪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并非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和纯粹的利己主义者（董志强，2006），在采取行动时，个体不仅会考虑其行动会带来何种物质损益，也会考虑其行动是否符合

^① 亦有译为赫伯特·金蒂斯。

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① 人类行为有物质动机的一面，也有道德动机和关注他人的一面；人们不但关注结果，也关注获得结果的方式，以及自己的结果和他人结果之比较。某些人的确更自私自利，但也有人颇具公德公心。行为经济学用“社会偏好”或“亲社会性”对此予以总结（Carpenter, 2010: 247—252），桑塔费学派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② 和金蒂斯等人称之为“他虑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鲍尔斯, 2006；金蒂斯, 2011, 2021）；金蒂斯（2011）还将其视为人的“社会性”之表现。

瓦尔拉斯范式主流经济学假设个人偏好稳定不变，但真实个人的偏好极易随情景而改变。无关选择不改变偏好关系，这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公理，即偏好独立性公理。而真实世界的故事却是，个人偏好极易受到无关选项或背景框架的干扰。始于 Huber, Payne, and Puto（1982），如今已被广泛注意到的“诱饵效应”（decoy effect），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③ 人们的偏好极易被情景（context）左右，具有情景依存性质；也因此，通过改变框架而影响人们选择行为的助推策略比比皆是（Thaler and Sunstein, 2008）。^④ 偏好除了在短期中易受情景影响之外，在长期中也会演变。长期来看，人的偏好和制度是共同演化的，偏好会塑造制度，而制度也会反过来塑造偏好（Bowles, 2004,

① 这些证据可见于任何一本行为经济学教材或专著，如鲍尔斯（2006）、鲍尔斯和金蒂斯（2015）、金蒂斯（2011, 2021）、金蒂斯和鲍尔斯等（2005, 2006）、Gintis et al.（2005），以及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2010）。此外，国内汪丁丁（2011）、董志强（2020），以及叶航、陈叶烽和贾拥民（2013）等著作对此有大量文献回顾。

② 亦有译为萨缪·鲍尔斯。

③ 诱饵效应是一种依存于情景的选择模式：在两个选项中，加入第三个相对较劣的选项（诱饵），会改变人们对原来两个选项的选择概率。一个典型例子是 Ariely（2009: 12—18）提到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定价例子：当杂志提供两种订阅套餐，（1）“仅电子版”59美元/年，（2）“纸版+电子版”125美元/年，则选择套餐（1）的用户比例高达68%而选择套餐（2）的占32%；当杂志再追加一种套餐（3）“仅纸版”125美元/年之后，此时选择套餐（1）的用户比例只占16%，而选择套餐（2）的高达84%。这里，套餐（3）显然劣于套餐（2），故不可能有人选择套餐（3），它仅仅起到陪衬作用，但它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人们的选择行为。

④ 助推（nudge），即以较低成本的干预措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Thaler and Sunstein（2008: 6）定义助推为：在不禁止任何选择或并不显著改变人们经济动机的前提下，以可预测方式改变人们行为之选择架构的任何方面。最近，也有著作开始关注助推策略的阴暗面（Madi, 2020）。无论“助推”得以可行，还是其阴暗面得以存在，其本身都表明人们没有完全的经济理性。

2016; 金迪斯, 2011, 2021; 董志强, 2008)。社会中的制度、规范、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既是千千万万个体各有所爱、各有所图的行动结果, 也是禁锢着千千万万个体心灵的无形枷锁。

虚构“经济人”在主流经济学中举足轻重, 然而, 一旦离开经济学进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 它只若风过无痕。这种学科影响反差, 很可能与主流经济学故步自封有关。主流经济学家不是没有意识到人的偏好并非简单划一的事实, 但他们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地一样, 直接回避了现实的挑战。有一本号称风靡美国三十年的经典教材, 描述了这种倾向 (Hirshleifer, Glazer, and Hirshleifer, 2005: 12—13,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传统的狭义经济学并不探究生活目标 (即品味或偏好) 的起源。在一个社会里, 人们可能保护孩子并吃牛肉; 但在另一个社会里, 人们却保护牛并允许杀婴。但通常来说, 人们的目标与偏好确实存在着可以分析的来源……人类历史上很多关键的社会变化, 都是由于人们的人生目标发生了变化……从古代以色列人的先知, 到耶稣和穆罕默德的神职人员, 再到近期西方宗教信仰的衰落, 人们追寻的生活目标一直在变, 这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但是, 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打算解释这些决定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

那些影响个人行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等重要因素被抛弃了, 个人置身其中的“社会”这一行动背景被抛弃了, “经济人”成为求解最大化的机器, 瓦尔拉斯经济学因此成为超越历史、地理乃至文化和社会的普世的“纯粹经济学”。^① 问题是, 真实的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之中, 除了物质生活之外, 他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 怎么可能由单调乏味的“经济人”和沉闷的“纯粹经济学”来完整刻画呢? “如果人性驱动着经济制度的演变, 且人性具有普遍性, 那么为什么经济制度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形式呢?” (道宾, 2009: 33) 历史和偶然事件对社会发展

^① 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不需要历史, 反映在当今时代的经济学教育中, 学生们在课堂上被灌输以各种经济模型和理论时, 很少接触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似乎忘掉了历史, 尽管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历史非常重要。

轨迹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空下经济行为的不同也需要解释。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是让理论模型逼近现实，而不是假想现实符合理论模型或者将不符合理论的事实一概斥为“异象”。

二、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不可分离

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不可分离，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不过，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论断。

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不可分离的思想或许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Adam Smith），虽然他并未如此表述。斯密的《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原理，世人皆知，但他在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斯密，2018）中开篇即大谈行为的合宜性，并主张推己及人便是行为合宜性的标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从来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行为，即便他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思考如何采取行动时，也总会有意或无意地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宜得体。

Bowles and Hwang（2008）曾进一步结合人类的某些心理机制，论述经济动机和道德动机不可分离。这些心理机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1）框架效应，即外在激励往往为个人决策设定了框架，这些框架有可能过于强调物质利益而挤出道德动机；（2）委托人采取的激励措施本身会提供有关委托人偏好的信息或者对代理人的某些信念，这些信息和信念也会被代理人解读；（3）人们对行为有可能存在“过度辩护”，即个人对某个行为赋予更多外部理由时，他就更可能基于外部理由而不是内部动机去采取相应行动；（4）委托人的激励会影响代理人的偏好更新过程，使代理人的行为偏离自私自利的方向；（5）外在激励也有可能挤入（crowd in）或挤出（crowd out）其他的社会偏好。针对上述五个方面，Bowles and Hwang（2008）引证了不少事实或实验证据；在后来的著作中，Bowles（2016）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动机和道德动机不可分离的观点。

桑塔费学派倾向将道德动机或社会动机视为人的内在本能动机，他们主张人的天性中同时具有关注自身利益和关注他人利益的两种不同倾向。这应该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另一半故事是，不排除人们的道德动机有时是策略性的，而非出自本能或天性。从人的社会性出发，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不可分离的完整故事如下：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总会存在有强烈社会偏好、道德

感或规范倾向的人们，不妨称其为群体 A；也可以存在社会偏好、道德感或规范倾向很微弱甚至没有的人们，且称其为群体 B，那么，

(1) 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A 做决策时具有社会动机是自然而然的；

(2) 当 A 的决策并不仅仅考虑物质利益时，B 的物质利益最大化策略往往并非最优。在社会互动情形中，即便 B 是一个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也不得不将 A 的社会动机考虑在内，从而使他自己的决策附加上策略性的社会动机；群体 A 在人口中占比越高，B 的决策中（策略性）社会动机就越高。

可以用候车排队的例子来直观说明上述道理。在一群“经济人”中，候车不会出现排队，只会出现囚徒困境：无论其他人是否排队，抢先上车始终是自己的占优策略。但是，如果存在一部分人有规范倾向而坚持排队，那么一个具有社会意识或关注社会结构（此处为 A、B 两类人员占比）的“经济人”就需要权衡自己是否排队：他不是对一群经济人作出反应，而是对特定的社会结构（各类人员占比）作出反应；他不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追求对特定社会结构的最大适应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很简单，只管抢先上车就是了；但是这个关注社会结构的经济人也会意识到，抢先上车虽然符合经济利益（这里是节约时间或抢先占到好的座位），但显然不是最适应当下社会结构的行为，那些有强烈社会动机的人可能会对他进行谴责、排斥甚至暴力相向。所以，人们不应有这样的结果感到奇怪：当老老实实排队的人足够多时，尽管抢先上车最符合一个“经济人”的经济利益，但这个经济人会克制自己老老实实和大家一起排队，只因他不想触犯众怒。有意思的是，老老实实排队的人群中，很可能不乏这个“经济人”的同类，这些“经济人”与那些具有内在道德动机和规范倾向的人们在排队表现上并无差别。读者不妨想想，这个社会最自私的人，有时也会表现出慷慨，他并不愿意被社会指责为过度自私，是这样吗？

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生活中会存在一些隐形的法则，约束理性人的自利行为，使得理性人自利原则并不等同于任性自利。这些隐形的法则既可以是人们的内心所求，也可以是一种外在威慑。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或多或少都具有“社会性”，其行动决策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其他人，必然会有社会动机，无论这种社会动机出自内在本能（真的好人），还是出自策略算计（伪装自己是个好人）。完全没有社会性和社会动机的个体，实际上是荒岛上的鲁滨逊。孤绝于社会之外的鲁滨逊，不需要考虑其他人，因为不存在“其他人”。

在鲁滨逊经济中，没有社会交往，也不存在道德规范，正直、诚实、公平等价值追求对鲁滨逊毫无意义。某种程度上，瓦尔拉斯经济学倒更像鲁滨逊经济学，尽管其中有很多同质的个体，但这些个体不需要社会交往，不受道德规范约束，不考虑他人的幸福，没有社会动机。一旦鲁滨逊离开荒岛，回到人类社会，他就不会再是纯粹的瓦尔拉斯“经济人”，他的行为将会随环境而变化，他有时表现得像圣人，他有时也可能成为恶人，他大多时候也许只表现为一个凡人。利己之心、公平动机、互惠偏好，以及正直、耻辱、厌恶、嫉妒等情感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着鲁滨逊在社会中的行为。

因此，所谓社会偏好，或者社会性动机，只有在“社会”中才有意义；只要存在“社会”这个东西，生活于其中的人就必然有社会性偏好和动机。策略性的社会动机可以与情景依存偏好联系起来：在不同社会情景中，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有可能是对特定社会结构的适应或不适应，从而个体总是需要评估所处的社会情景来选择最具社会适应性的策略。在另一个视角，周业安（2020）指出，诸如前景理论和社会偏好理论，都指向个体行为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质，这些社会属性不仅体现在约束条件上，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决策系统。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或新古典范式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它剥离了个体的社会属性。

三、“社会性”的演化根源

人类是如何获得“社会性”的？部分答案涉及人性的演化。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自然塑造了我们的智力、语言、开心、嫉妒、忠诚、羞耻感等诸多有利于社会合作的秉性。道德情感以及设计和实施社会规范的智力、语言能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不是猫的本性、蜘蛛的本性或者狒狒的本性的一部分（Bowles, Edwards, and Roosevelt, 2005: 49）。

从演化视角来看待人的社会性，就需要回答：那些偏离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性何以能在演化中胜出？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成为“经济人”的天下？基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难以接受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因为如下的逻辑质疑始终存在：如果遵守社会规范具有物质上的代价，这就会损害个体的生存机会，令个体在演化中处于劣势。由此不难理解主流经济学的追随者为何强烈抵制将道德纳入市场经济学的分析之中。然而，

这里所谓的逻辑问题，实际上忽略了如下事实条件：“社会”一旦形成，其本身就是影响演化过程的重要力量。个体的生存机会，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interaction）中决定的；特定行为模式带来的适存性并不总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往往因社会中各种行为模式的结构分布而改变。换言之，个体最具适存性的行为，是对其所处社会结构作出长期的适应性反应，而不是单次的最优化计算。

比如，Bowles and Gintis（2004）关于强对等性（strong reciprocity）演化的模型表明，绝对自私者（其行为模式为“始终选择欺骗”）构成的社会并不是演化稳定的；强对等者（strong reciprocator），即有条件的合作者（其行为模式为“你合作我便合作，你欺骗我也欺骗”）可以成功入侵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群体，因为强对等者一方面能够让自私者捡不到便宜，另一方面却可以在强对等者之间分享更高的合作收益；随着强对等者数量增多，在人口中占比足够高，无条件合作者（其行为模式为“始终选择合作”）也可以生存并扩散开来；但是，无条件合作者占比提高，又会导致绝对自私者的崛起；最后的稳定状态是，社会成员将是多元化的，绝对自私者、无条件合作者、强对等者的数量大致各占1/3。Bowles and Gintis（2004）的模型不仅可以解释社会成员或个体偏好的多元化，也回应了前述“逻辑问题”可能不是问题。

公平偏好是一种被广泛确认的稳健的社会偏好。董志强（2011）探讨了公平偏好的演化逻辑，在一个需要合作的世界中，如何分配合作剩余是合作成功的关键，如果双方索取的分配份额超过全部剩余，合作就无法达成。结果，给定人们更自私贪婪和更慷慨大度的索取份额分布，自私贪婪者虽然获得剩余的份额大但合作机会将更少，慷慨大度者合作机会多但获得剩余的份额将更少，两者都不具有最佳的适存性；只有相对公平的索取份额，才最能实现合作剩余分享和合作机会的最佳平衡。在其演化模型中，最贪婪和最慷慨的个体最早被淘汰，演化结果最终将收敛到相对公平索取的个体占据社会的主流。

最难被解释的社会性是利他主义，西蒙（2011：77—89）对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分析。他从演化逻辑上说明：当人们是有限理性的时候，利他主义反而可以涌现；在个人层面，利他主义与演化适应性可以兼容；而群体的选择也会加强利他主义。西蒙（2011：82）提出了“顺从性”（docility）概念，这个术语表示人们会受到社会影响并有接受社会影响的倾向，比如，听从来

自恰当的社会渠道的建议。西蒙（2011：83、84）指出，“我们所拥有的大多数知识是顺从的产物，而不是从个人经验中得来的。我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去摸过火热的炉子，但是却知道不能这么做”，“如果一个物种只有有限理性，而且具有可观的顺从性，如同人类那样，就会在其行为中表现出相当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该物种的成员会经常从事一种行为，即牺牲自己的一些适应能力以提高其他成员的适应能力”。而且，聪明人并不是精明者，“聪明的人会比其他人更顺从，而不是更不顺从……更高的顺从性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更容易受到愧疚或羞耻感的感染，或者——用更容易被接受的话来说——更强烈的、遵循社会规则行事的责任感。”西蒙的“顺从性”理论与金迪斯（2011）“人们有规范倾向”的观点异曲同工。

将人类心理和行为视为演化的产物，已成为行为经济学中主流的观点。《经济展望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年春季号刊登了四篇行为和演化经济学专题论文，均持上述观点。过度自信、损失厌恶等都可能是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演化适应的结果（Camerer, Loewenstein, and Rabin, 2004）。个体的“社会性”作为演化的产物，意味着金迪斯（2011）的建议是合理的，他认为应该把“社会性”视为人的内在动机而不是外在约束。社会性是人类适应社会生活的结果，已由演化力量写入人类的心灵。

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金迪斯（2021）^①更系统地论述了个人和社会相互纠缠的关系。他指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独特性都来自人们建构社会规则并在规则框架内相互交往这一基本事实。在社会规则框架内交往需要道德观念，而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先于法庭、监狱和教师传授的道德之前的存在。个人行为的意念深受社会的缠绕，在决策时不仅仅依据个人自身掌握的信息和笃信的信念，也会依据所属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信息和信念。社会将价值观施加于个体，遵循社会规范或价值本身可以成为人们的行动目的。人类的道德偏好有自虑（self-regarding）、他虑（other-regarding）和普世（universal）三个维度，故人们的行为选择总在关心自己、关注他人和普世道德之间权衡。这也说明，人的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利益计算优化问题，而是如何适应不断演化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从社会层面来说，个体追逐私利若以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那么社会群体就难以为继，道德规范节制人们对于私利的过度重视

^① 英文版可参见 Gintis（2017）。

和过度追逐，本身可以通过更好成就社会群体来增强个体适存性。即便在个体层面，某些规范的内化也可提高个体的适存性，比如筹划未来、讲究卫生、积极的工作习惯、对情绪的控制等等。道德规范的内化使得行为者改变目标，而工具性和传统型的文化形式仅仅帮助个人达到既定目标。对于人类乃至其他物种来说，这些目标与生物适存性有关，却不能简化为生物适存性（Gintis, 2003）。

四、“社会性”成就社会

本文第二部分的排队候车的例子，可以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在现实中也都能找到对应的证据。它也表明，一群“经济人”在一起的结果可能（通常）很糟糕，会陷入囚徒困境式的结局。当然，对此也有一种辩护意见，就是利用重复博弈的“无名氏定理”及其发展。^①如果人们眼光长远，注重未来，并且行为失误的噪声很小，那么重复博弈的人们将可以达成合作均衡，这就是无名氏定理的核心思想。从这一表述就可以知道，达成合作均衡的条件并不容易满足；而且一旦脱离重复博弈进入单次博弈，就不会再有无名氏定理了。即便上述条件和“重复”情形都得到满足，合作均衡也只是可以出现，而不是必然出现，因为无名氏定理只是一个存在性定理。重复博弈中除了合作均衡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均衡（包括非合作均衡）。桑塔费学派坚持认为，利己主义模型解释不了合作，合作需要依赖亲社会情感和强对等性（金迪斯，2011），人类之所以能够实现大规模合作，只因我们是具有社会性的“合作的物种”（鲍尔斯、金迪斯，2015）。

回到候车排队的例子。虽然没有人正式研究过各地人们的候车行为，但我们大都有在不同地方与不同人群候车排队、购票排队、用餐排队等经验。在集体效力高的地区，人们遵守规范的倾向更高，排队秩序就越井然；而在集体效力低的地区，人们就表现得更像经济人，排队秩序就更混乱。这应该支持了桑塔费学派的想法，更多的利己主义行为往往是合作失败和秩序混乱，

^① 相关论文请参阅 Aumann (1959); Fudenberg, Levine, and Maskin (1994); Bhaskar and Obara (2002)。综合性的介绍请参阅金迪斯 (2011: 131—144) 和董志强 (2020: 130—140)。

秩序的形成需要人的道德动机和规范倾向等“社会性”。

主流经济学家习惯把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心理和行为归结为“非理性”，正如他们习惯于把主流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称为“异象”（可是，难道不应该是把无法解释现象的理论称作“异论”吗？）。在一本较早的著作《理性的边界》中，金迪斯（2011：179）竭力论证，人类理性的边界不是各种形式的非理性，而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性。有些看似非理性的心理和行为，恰恰是形成社会秩序所必需的黏合剂。与西蒙（2011：77—89）指出有限理性反而可以催生利他主义的睿智观点类似，近来一些研究表明社会秩序与人类的非理性（即金迪斯所说的社会性）有关。比如禀赋效应，这种心理倾向会过高地评估个体拥有物的价值，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不理性，但它恰恰是形成自然产权这类自发秩序所依赖的条件。^① 禀赋效应在许多具有领域行为的动物身上也可观察到，并不限于人类。自然产权秩序也不独见于人类，有领域行为的动物往往也会自发尊重地盘权。有意思的是，从生物学家 Smith（1982）早期对动物界所有权的研究，到 Gintis（2007）的私有产权起源模型，都始终面临如下问题：产权均衡和反产权均衡在相同条件下并存。也就是，存在产权均衡的时候，刚好就存在反产权的均衡；但这一结论很不现实，因为现实中很少有反产权均衡。Smith（1982）认为需要考虑博弈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来解决这一问题，而禀赋效应就构造了这种非对称性。^② 没有安全的产权，许多社会性物种就会消亡（金迪斯，2021：9），故看似非理性的禀赋效应，无论对于许多社会性动物，还是对于人类的社会生存和延续，皆至关重要。

个人高度理性的行为，可以产生秩序的失败。候车排队是一个例子，其中的理性“经济人”将走向囚徒困境，是合作秩序的失败。罗纳德·海纳（Ronald A. Heiner）对最优化理论的批判是另一个例子，他的模型揭示了理性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将导致人的行为不可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社会性”作为人类理性的限制何以重要，虽然他的研究本身并非人的社会性之演化（Heiner，1983，1985）。在海纳之前，对最优化理论的批判主要在于

① 对此的详细考察可参阅金迪斯（2011：145—159）、董志强（2020：223—231）、金迪斯（2021：165—183）、董志强和张永璟（2016）、董志强和李伟成（2019）、Gintis（2007）。

② 关于禀赋效应对自然产权的基石性作用，这里的介绍过于简单，读者欲详细了解可参阅董志强（2021）的综述。

质疑个体进行最优化的能力，这并不新鲜；海纳则从最优化的真实动态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可观察行为，来批判最优化理论。其核心的结论令人震惊：完全理性个体的行为实际上是难以预测的，越是理性能力完备的行为主体，其最优选择行为越不可预测。倘若海纳是对的，我们又怎能指望从完全理性个体组成的社会中看到规律和秩序呢？

海纳的模型值得更详细的说明。在海纳看来，主体行为的规律性，来自“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区分偏好行为和非偏好行为的不确定性。此类不确定性要求行为被某种机制所控制，而这些机制限制了选择潜在行动的灵活性，或者对某些可能促进采取特定行动的信息产生了选择性警觉。^① 这些机制，简化了行为模式的复杂性，而使之易于被观察者识别和预料到。在没有不确定性的特殊情形中，无所不知且彻底最优化的主体会以完全灵活的方式去回应环境中的每一个扰动，而这样的行为将不会产生易于识别的模式，因而也就极其难以预测。这意味着，理性最优化过程并不会带来行为的可预测特征；而且，演化过程通常不会产生近似最优化的行为；相反，只有当不确定性成功阻止了个体最优化时，可预测行为才会演化。^②

人类社会及其结构变得日益复杂，社会中的行为日益难以预测，原因之一就是人类“理性”程度不断提高。动物的行为比人类行为更容易预测，因为它们的理性不及人类。Heiner（1983）指出，当不确定性真真切切存在的时候，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去响应更多信息，或采取复杂而全面的行动，并不必定会改善主体的表现。Axelrod（1980a, 1980b）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实验就是例子。在其实验中，聪明的数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

① 这里的“某种机制”，从当代行为经济学视角来看，人类行为固有的偏误（bias）就是这样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机制。这些偏误导致人们以固有的模式行事，而不是时时刻刻采取灵活的最优化；顽固不化的行为偏误提升了个体行为的可预测性。行为经济学家 Ariely（2009）曾写过一本畅销书《可预测的非理性》，若结合海纳模型则更激进的结论是：完全理性个体的行为将不可预测，行为可预测的是不那么理性的个体。笔者认为，“启发式”（heuristics）这种偏离最优化方法的决策也可能增进了个人行为的可预测性。

② 笔者认为，上述思想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亦有译为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的“理性有限”和“自发秩序”观是高度兼容的。哈耶克认为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因而无法充分理解复杂的环境；理性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抽象思想能力”，它服务个人的方式便是把复杂现象抽象成一系列可把握的一般性原则，进而根据这些原则在复杂环境中行动（哈耶克，1997：74）。

家、社会学家们提交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有些极其复杂。所有策略中，表现最成功的策略恰恰是最简单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而表现最糟糕的却是最“复杂深奥”的通过学习和概率调整过程来指导行为的策略。人类在社会中的适应性行为，其实与个人对组织的适应性决策类似。Simon（1955，1979）的“满意”决策思想，代表了组织内部的目标变量和为了实现该目标所评估的信息范围之间的反馈机制。随着时间推移，反馈过程将引导和规范信息的使用，并产生在个人和组织内演化的行为复杂性。越来越复杂的学习、认知和决策算法，也可以同样被解释。存在如何利用信息或何时采取特定行动的不确定性时，允许灵活地响应信息或选择行动，并不一定会改善表现。

本部分内容表明，受到限制的理性，有利于产生社会秩序；不受限制的理性，反而可能摧毁社会秩序。这与两百多年前写下《国富论》的斯密同时写下《道德情操论》一样，看似自相矛盾，有点出人意料。但所有这些，现在正日益变得可理解。市场中呼风唤雨的经济人，其理性需要受到来自道德规范的丝丝束缚，才会使得人类社会这盘大棋顺利地走下去。

五、对市场竞争均衡的批评

市场实现的竞争均衡是最具效率的结果，而有效率的结果也总可以由竞争市场来实现，这是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必然谈及的福利经济学两条定理，它们被视为对市场经济优越性的最有力的辩护。但这有前提，就是需要一切都运作得很好。如果一切运作得不那么好，比如“经济人”的谋生之道不只是生产和交换，还包括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又会如何？

对竞争均衡的批评声从来没有消失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走向危机和失衡，这自不必说；即便主流经济学阵营内部，也意识到竞争均衡理论存在某些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①就告诫说：“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但即使当竞争是建设性的时候，也没有像合作那样有利。”（马歇尔，2005：6）瓦尔拉斯竞争均衡的存在性被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和热拉

① 亦有译为阿弗里德·马歇尔。

尔·德布鲁 (Gérard Debreu) 等证明之后, 其经济理论的稳定性就成了研究重点, 可是那些证明稳定性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Fisher, 1983)。Sonnenschein (1973)、Mantel (1974, 1976)、Debreu (1974) 的结果表明, 基于试探过程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得不到一般的稳定性定理。近年的一些研究则试图采用新的动态方法, 比如从生物繁衍到模仿成功者的复制动态等演化动态模型, 但仍缺乏竞争性交换的一般稳定性模型 (金迪斯, 2021)。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大师阿里尔·鲁宾斯坦 (Ariel Rubinstein) 与其合作者提出的丛林经济模型 (Piccione and Rubinstein, 2007), 它实际上是主流阵营内部对竞争均衡的反思。在丛林经济中, 资源配置取决于武力强弱而不是市场交易。两位作者证明, 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中也有稳定的帕累托有效均衡, 一样可以导出福利经济学三条定理。这似乎暗示, 福利经济学定理不过是数学把戏, 同样的数学语言体系可以证明与市场经济遥遥对立的丛林经济中竟然存在与市场经济同样的福利定理, 两者竟然有同样的帕累托效率。这挑战了“阿罗-汉恩-德布鲁”体系对市场经济的辩护, 它意味着, 要想证明市场经济是更好的, 单靠帕累托有效这一标准并不足够, 一定还要附加其他标准, 比如关于初始资产的分配。这就必然涉及价值观, 或人的社会性了。不妨假想, 存在如下两个经济: 市场经济, 他人手中有 100 元, 你手中有 1 元, 你们可以“自由”竞争; 丛林经济, 你们需要武力竞争, 不过他人的拳头和你的拳头大小一样。请问你愿意选择生活在哪个经济中呢? 面对这样的情形, 我们不知道多少人会选择市场经济, 但肯定也有人宁可选择丛林经济。Piccione and Rubinstein (2007) 写道: 丛林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相对比较, 取决于如何看待模型中经济主体的特性。倘若市场中初始财产的分配体现了我们希望促进的社会价值观, 我们可以接受市场的结果; 倘若初始财产配置是不公正的、非诚实的或武断随意的, 那我们可能不会喜欢市场体制。同样, 若权力是合意的, 我们会接受丛林体制; 若权力分配体现的是威胁我们生命的残忍暴力, 我们显然就不会喜欢丛林经济。

桑塔费学派对竞争均衡的批评在角度上有所不同, 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Bowles and Gintis, 2000; 董志强, 2020: 159—160)。第一, 一般均衡理论有赖于一个瓦尔拉斯拍卖者, 缺乏对市场过程的考虑, 排除了对市场动态理论的需要。第二,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需要有一个均衡价格体系来支持, 并且这个价格体系应全局稳定, 即从任意初始状态开始, 经济都收敛于特定的

均衡，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要求极难得到满足。第三，一般均衡理论有太多与现实经济相距甚远、不切实际的假设。比如要求消费者效用函数严格递增且凹，谈判无成本，市场充分竞争，所有的外部性都得到内化。第四，市场完备性假设是不现实的。许多有利的经济交易，因为过高的交易费用或其他问题而不能达成。Bowles and Gintis (1992, 2008) 认为，要回应真实世界的挑战，就需要观察分析真实世界的合约与社会结构，而他们也确实提出了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关理论：供求的力量常常并非势均力敌，市场的短边方 (short side) 将获得“权力”，即短边方可以通过可置信的威胁或制裁来影响对手的行动。雇主是短边方，他以解除工作来威胁或惩罚员工是可行可信的；而反过来作为长边方的员工以离职来威胁或惩罚雇主则不太可行也不可信。所以雇主对员工拥有权力，这就是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曾刻画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马克思, 2018: 205)。同理，资本市场上贷款人对借款人拥有权力，经理市场上所有者对经理人拥有权力。^①

对竞争经济均衡理论的另一个批评视角来自冲突主义。以竞争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和谐经济论：只要充分竞争，便可抵达天堂。但在另一些经济学家 (如马克思) 的眼中，经济中充满了冲突的力量。人们在市场中的“竞争”有可能是非正当的，甚至突破道德底线，这在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被视为寻常的事情，却很少被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有少数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确注意到了，比如威廉·鲍莫尔 (William J. Baumol) 对企业家精神的破坏性和 Hirshleifer (2001) 对经济行为的阴暗面，都有非常深

① 鲍尔斯和金蒂斯甚至提供了一般均衡下的社会阶级形成理论，他们自称这可以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但实际上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有很大差别。在鲍尔斯和金蒂斯那里，阶级是个体在财富约束下的选择 (或归类) 结果，而马克思的阶级本身是一个 (群体层面的) 行动者。顺带说明，鲍尔斯和金蒂斯早年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对社会性的理解可以说根植于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但后来两人 (尤其是鲍尔斯) 引入了演化逻辑，从而让其对人的偏好与行为的理解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的痕迹，但又不完全相同。马克思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的，鲍尔斯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的。相关论述可参阅 Bowles (2004)、金蒂斯 (2021)、董志强 (2020)。

人的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些深刻洞见在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获得足够重要的位置。当冲突、掠夺、欺诈、腐败、暴力威胁等普遍存在于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这是妨碍市场有效运行的问题;人类走到今天的文明社会,在政局稳定的地区,显性的暴力冲突是否减少或许存疑,但在技术、组织和社会日益加剧的复杂性中隐性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很容易变得更多。如今,已经很难想象不受监管的市场可以健康运行。金迪斯(2021:6)指出,那种认为经济理论能够在不依靠政治权力分配或不监管市场参与者的道德承诺的条件下,就能帮助实现经济成功的观点,不但错,而且错得离谱。

这些对竞争经济均衡的各种微词或批判,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瓦尔拉斯体系中忽略了个体“社会性”的批评。与世隔绝的鲁滨逊,只有一种手段让自己过得更好,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生产和创造更多财富。故鲁滨逊是独立自主的,但在生存手段上其实也是别无选择的。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除了自己生产和创造更多财富,还可以从与他人多种多样的互动中获得更多好处。这些互动在一个极端是礼尚往来,这属于社会生活;在另一个极端是明争暗抢,这属于政治生活;这两个极端中间是等价交换,这属于经济生活。这些故事全然不会发生在荒岛鲁滨逊的生活中。故社会中的个体不再似荒岛鲁滨逊那样独立,而是相互依存的;而荒岛鲁滨逊也不会面临礼尚往来、明争暗抢、等价交换。^①社会中个体的经济行为究竟表现为建设的还是破坏的,驱动个体行为的力量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人们的面孔是圣人的还是凡人的或恶人的,取决于他置身的社会情景。同样,竞争均衡是否能到达天堂,也取决于社会是更多唤醒了善意,还是触发了恶行。

六、三维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均衡到社会均衡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推崇备至,但非主流经济学家都不太相信竞争均衡可以到达天堂。桑塔费学派的基本看法就是,用利己主

^① 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中个体的相互依存性质,虽然他强调的重点是阶级关系而不是个体行为:“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马克思,2018:94—95)

义模型无法成功解释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合作行为，在纯粹自利的主体之间无法产生稳定的合作。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合作与人的社会性密切相关，亲社会情感和强对等性是人类社会合作的基石（金迪斯，2011；鲍尔斯、金迪斯，2015；董志强，2020）。市场，被视为一种扩展的合作秩序，由此可得到的一个推论便是：全部由毫无社会动机的自利“经济人”所组成的市场经济并不能有效运作，要么不存在经济均衡，要么面临多重均衡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一结果是在整体主义分析下得到的；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巨大的不平等及其累积，这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劳动力之间的问题。这当中其实也涉及个体的理性选择如何带来社会群体的不利后果，每个资本家追求利润（榨取剩余价值），劳动者追求个体的生存，但结果却是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两大群体（马克思称为两大阶级）间形成巨大财富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观点令我们深思。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一个群体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否则，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下去。”（福斯菲尔德，2003：102）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演进的结果并不是个体行为稳定基础上的唯一稳定均衡，而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总体结果可能是不稳定低级别实体的长期均值（Bowles，2004：479）。从经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而主流经济学至今仍然缺乏可以成功解释经济危机的理论。

我们需要承认“经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这些个体具有社会性。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生活则是丰富多样的。人类有经济生活，积累了大量的市场交换知识和习惯；但人们也有社会生活，会在意那些与其有社会关系的人，并以不同于等价交换的礼尚往来的方式和他们相处；人们也有政治生活，会通过政治活动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甚至对他人进行武力掠夺。即便是市场经济的活动，通常也是在政治规则下进行的；而政治活动本身，又往往以经济资源为重要后盾，并且要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来获取合理性乃至合法性。故个体不是分别独立地参与这三种生活，它们是水乳交融的。在理性所不能及的地方，决定个人行为的是社会演化过程中个体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其融合）中所存在的大量社会知识和个人知识所累积的经验原则、生活习惯，道德原则和规范倾向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因此，经济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政治经济学，应该有“市场 - 政府 -

社会”三个维度,^①应该关注的是社会均衡而不是经济均衡。^②

市场最关键的特性是,它是非合作交易的结果,而且那些非合作交易又是大量交易的结果(Bowles, 2004: 485)。市场经济本身可以得到好的结果,也可以得到差的结果(存在多重均衡)。如果市场运行的环境是健康的(法治公正、分配正义、产权得到良好保护),那么基于市场的合作秩序将非常稳固,市场竞争就不仅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还可提供无需集中决策的奖勤罚懒和抑制腐败的纪律机制。然而,如果市场运行的环境并不健康,比如缺乏公正法治、契约机会依赖于财富和缺乏产权保护等,那么惩罚程序将无法指向正确的目标,市场就极可能被扭曲而产生低效率结果。正如 Acemoglu (2010: 40) 写道:经济学这门学科深刻而重要的贡献,在于洞察到抽象层面的贪婪既不好也不坏;在合理的法律和监管下,贪婪可被疏导为利润最大化、竞争和创新行为,成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若没有适当的制度和监管约束,贪婪就退化为寻租、腐败和犯罪。

与市场中自愿的非合作交易活动不同,政府运用权力允许(乃至强迫)个体进行合作,要求交易的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此消除或者缓解协调失灵问题。在诸如迅速界定、安排和实施产权,或者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宏观经济等方面,市场和社会都缺乏像政府那样迅疾有力而指向明确的霹雳手段,依靠市场的选择压力和社会自发秩序来解决某些问题往往会面临多重均衡问题(有些均衡是低效的)。此时,一次性政府干预可实现社会希望的均衡。^③不过,政府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也有其缺陷:政府官员难以获得生产者和消费者掌握的私人信息;同理,选民也难以掌握政治家的私人信息;此外,涉及大量主体的政策决策中,几乎不存在理想的决策程序;最后,若政府干预过于强大,以致压制了市场结果,就会催生寻租和逼租行为。这一切都会

① 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2010)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三个维度,即竞争、统制与变革,与本文的“三维”有别,但也有近似之处:“竞争”即市场竞争,“统制”则是企业、国家和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变革”是对历史变革进程的关注。

② 金迪斯(2021)曾大胆尝试在经济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考虑社会性行动主体,来拓展出一般社会均衡模型。不过,本文的社会均衡更适合理解为社会稳定或社会合意,与金迪斯(2021)有别。

③ 比如,政府禁止使用童工的措施,可以促使均衡从贫困陷阱向提高儿童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新均衡转化(Basu and Van, 1998)。

导致政策扭曲、资源浪费等不良后果。

社会利用个体的“社会性”，以其规范和道德伦理原则要求每个人对他人承担责任。在宏观的社会层面，社会有其流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规范，它们作为长期演化的产物，通过有益于社会平稳持续的内在动机而弥补着市场和政府的某些缺陷。一个日益被接受的概念是社会资本，当代经济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诸如信任等社会资本对于市场和政府更有效运作的重要性；即便在古典政治哲学家那里社会资本也很重要，比如 Hobbes（1949：101）就曾说：没有信任，就没有契约。

在中观社会层面，社区治理已经被视为市场治理、政府治理之外的第三种重要治理手段。社区，或者共同体（仅为翻译不同，英文为 community），作为治理机构具有独特的能力：其并非像市场那样匿名交往，成员重复见面的机会很高，因此社区中存在比市场更强烈的增进社会福利的动机；社区成员之间的监督相对更加容易，一切难以契约化的交易可以通过非契约交往来实施；那些演化而来的亲社会偏好，如强对等性、羞愧、诚实、慷慨、内疚等，都是有助于维持社区道德规范的因素。个体之间的交往很多是非契约性的，无论是与家人、朋友、邻居、上司、下属、客户的往来，还是与政府、公司、组织的接触，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签署契约，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这些交往，通常由社会规范加以调节，虽然它们发生在市场之外，但是却对经济结果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社区治理并不只停留在社区内部，它对市场和社会也形成了替代或影响。比如社会关系可以和法律互补，提高经济治理效率（董志强，2001），在产权法律保护不力的地方，社会就会存在更多私立秩序来保证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得以进行（迪克西特，2007；埃里克森，2016）；而强大的政府力量，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政府的“法”往往会受到社会力量（民间的“理”）的约束和限制（曹正汉、史晋川，2008）。政府需要社会认同和支持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而不能罔顾民意，因此社会是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力量。那些违背自发社会秩序力量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常常陷于失效的境地（萨格登，2008；董志强，2021），而善用和依赖自发社会秩序的力量可以让经济的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都变得更有效。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德公民，对于塑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不可少。

从现实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化的历程来看，市场力量确实也在不断接

受来自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矫正：不断地变革，正是曾被马克思宣判死刑的资本主义经济至今仍持续演化发展的原因。1900年前后15年，美国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美国总统都只有寻求摩根财团的帮助；老罗斯福总统希望改革，但是却没有实力挑战垄断资本家，直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政府才有机会进行改革，推动了劳工和就业领域的干预法案，此后30年陆续在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立法干预（郎咸平，2018：4—7）。实际上，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每经历一次经济危机，政府就获得了更大的干预经济的能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印证了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而一次次的危机也导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政府力量变得更强势恰恰是因为要回应社会诉求。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其他类似的政策，矫正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某些不平等，这种追求社会均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竞争经济均衡带来的失衡。

七、不平等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

导致社会失衡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对个体社会性和寻求社会均衡的讨论，无法回避对不平等的关注。即便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不就不平等问题做扼要讨论，针对市场和道德之间关系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梯若尔，2020：49）毫无疑问，每一种不平等都值得讨论和关注，但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是最需要关注的不平等。

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没有给收入分配留下太多空间。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每一种要素都会得到其边际贡献作为报酬；而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在长期中会停留在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生产；于是欧拉定理（即耗竭性分配定理）可以证明不存在某种要素对另一种要素的剥削。所以故事将变得很简单，为了实现公正的分配，只要促进市场的竞争性即可。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不会同意上述观点。主张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自不必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边际报酬理论尚未成形；马歇尔也从来没有接受边际生产力理论（福斯菲尔德，2003：131）；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的权力理论（前文已有介绍）也强烈反对上述观点；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如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等应该也不会同意上述观点。信息不对称、市场

交易费用为正、市场合约不能完备等被认为来自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恰好是鲍尔斯和金蒂斯用以反对竞争性市场的理由。“市场经济没有任何理由必然产生一种契合社会愿望的收入和财富结构，这就是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税收再分配制度的原因”（梯若尔，2020：49），然而主流经济学对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关注是不够的，“尽管再分配在政府各项行为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但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却少之又少”（图洛克，2017：1）。

关注收入不平等，意味着“经济”不仅涉及市场与效率问题，也与社会和公平问题有关，还涉及政治和民主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倾向认为效率和公平是对立的（即市场和社会是对立的），效率和民主是协同的（即市场和民主政治是协同的），这很可能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在效率与公平方面，Bowles et al.（2012）基于行为经济学、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微观经济学成果，竭力论证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要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代价；倒是应该考虑到人多种多样的社会性，不平等本身会带来代价，比如导致产权执行和治安支出过多，社会信任和合作水平下降，劳动生产率降低等；故不平等除了道德层面的问题之外，也带来经济效率低下；恰当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有助于激发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的社会阶层中的企业家精神，提高生产率。在效率与民主方面，民主政治也并非与市场效率完全兼容，假如社会财富只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穷人们有权对再分配政策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可以是高度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

对收入不平等的讨论是困难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而每个人各有其价值观。尽管如此，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也会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特别是生活在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更是如此。什么是合理的再分配？这个问题难有一致答案，但也并非全然没有一致答案。正如鲍尔斯论及经济制度对人们的影响时说，虽然每个人对“好日子”的定义不同，但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富裕生活机会的制度优于给更少的人提供富裕生活机会的经济制度。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渴求究竟是能更多地听歌剧，还是可以开宝马汽车？这类问题或许难以判断。但是也有很多问题的答案在人们心中是显然的，假如一个国家有大量儿童食不果腹，而这个国家同时又把大量谷物用于喂牛以生产更多牛排，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这是利用谷物的好方法。经济中一旦考虑社会问题，争议就非常多，但确实也有很多问题更类似于牛排与饥饿儿童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歌剧与宝马汽车之间的关系。

再一次，我们需要回到“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框架来讨论收入分配与不平等问题。如果单纯从市场经济学来看待再分配问题，市场效率要求保证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一种过程的公平。但人们也会认同：如果起点不公平，那么机会公平或过程公平就并没有正义性。所以社会正义要求起点公平，然后是机会公平或过程公平。问题是，如果起点是公平的、机会或过程是公平的，财富结果就往往是高度不平等的。高度不平等的财富结果，一方面可以导致新的起点不公平，另一方面也可能破坏机会公平，因为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契约机会往往取决于财富多寡。这就是说，纯粹的市场力量可以破坏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而这是社会正义难以容许的。依靠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市场通往不平等的力量进行矫正，是为了防止社会失衡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笔者相信，“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框架对于思考我国当代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工作也是有意义的，对于思考当代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经济形态也是有启示的。对于前者，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于后者，新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报酬递增和高度的契约不完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比旧经济的市场失灵严重得多，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等就更加必不可少。

八、总结与其他说明

本文的要点可总结如下。

1. “经济人”只是一种理论虚构，真实的社会个体具有多元多样的社会偏好，且个体偏好具有情景依存的性质。个体既具有内在的道德动机和规范倾向，也会在不同社会情景中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或合乎时宜。

2. “经济人”是超越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假想个体，其生活中只有纯粹的物质利益；真实的个人却生活在具体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之中，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他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并会形成适应这些生活的经验原则和行为习惯。

3. 以上，是个体的“社会性”。社会性是内在动机而不是外在约束，且只在“社会”中有意义。社会中的个体，其行为的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不可分离。因为，个体一切行为无论出自本能还是出于算计，在根本上都试图“谋

求”更好地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机会，是由个体与其他成员的互动交往决定的，而不是由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决定的。

4. 个体的“社会性”是个体和社会共同演化的产物。“社会性”使得人类可以集结成丝丝入扣的“社会”；社会缠绕着个体的意念，引导或迫使个体采取社会希望的方式行事。在有限理性的人群中，纯粹利己并不一定是最有生存适应性的策略，利他主义可以得到演化，这个世界也并不总是老实人吃亏。

5. 社会性是“理性的边界”，是对理性的限制。受限的理性有助于塑造出社会秩序（比如禀赋效应形成自然产权）；完全理性的群体反而可能遭遇因徒困境；倘若人人皆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计算器，人们的行为反而会变得不可预测，这意味着完全理性反倒有可能摧毁人类社会秩序。

6. 对瓦尔拉斯经济学竞争均衡的批评，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忽略个体的社会性的问题。经济竞争均衡忽略了个体所生活的“社会”，忽略了个体在“社会”中生存的多种手段：除了等价交换之外，还有明争暗抢和礼尚往来；人性除了有凡人的一面，也有恶人和圣人的一面。竞争均衡是否能到达天堂，取决于社会是更多唤醒了善意，还是触发了恶行。

7. 纯粹由自利“经济人”组成的市场经济并不能有效运作，要么不存在经济均衡，要么面临多重均衡问题。经济学有必要从关注“市场”一个维度向“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转变，从关注经济均衡转向关注社会均衡。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化的历程看，市场力量确实也在不断接受来自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矫正：不断地变革，正是曾被马克思宣判死刑的资本主义经济至今仍持续演化发展的原因。

8. 追求社会合意，防止社会失衡，使得不平等成为“市场-政府-社会”三维政治经济学最中心的问题之一。政治经济学必然有其价值观。市场效率由机会公平保证，但市场经济中契约机会往往取决于财富多寡，故市场力量本身有破坏公平的倾向，依靠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市场通往不平等力量进行矫正，是为了防止社会失衡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此外，由于本文内容过于庞杂，所批评的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信仰，为了澄清潜在的误解，进一步补充说明如下。

第一，笔者并不反对市场经济。毫无疑问，人类物质生活质量在最近数百年发生了历史性飞跃，这正是拜市场经济所赐。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之一，市场机制能够极大促进资源有

效配置。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注意到：人类行为并不限于市场领域 (domain)，也存在于规范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interaction) 并不限于匿名领域，更存在于非匿名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正式契约，大多数关系实际上是非契约性的。诸多事实表明，市场经济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面，并且单单强调这一面往往并不能得到社会合意的结果（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对市场恰当的监管、要求个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法律、引导个人尊重他人利益的道德规范，对于市场经济更健康的运行反而必不可少。^①

第二，笔者并不反对“信念-偏好-约束” (belief-preference-constraints, BPC) 分析框架（以下简称 BPC 分析框架）。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并不将自己视为主流经济学的革命，而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改良（董志强，2018；董志强，2020）。当把“经济人”变为社会性行动主体时，主流经济学的 BPC 分析框架本身仍可用且可行，只是需要在主体的行动目标中将单纯的物质利益扩展到道德规范等社会动机。当然，这样做的困难和批评声音在于，社会动机多元多样，偏好因情景而多变，将这些“社会性”纳入模型要么不经济可行，要么繁杂不堪。这的确是理论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过，因为理论工作困难而无视现实无异于掩耳盗铃，何况经济学家目前还不至于束手无策。经济学至少有两种方式来处理这一挑战。其一，对于已经被大量实证和实验研究确认的社会动机，可以通过改造主体的目标函数将其融入经济理论模型。这一方面已有的成功探索比如 Rabin (1993) 将公平动机植入经济理论，Fehr and Schmidt (1999) 建立的不平等规避模型，Bowles (2004: 121—122) 展示的可以兼容自利、利他和强对等性偏好的模型。其二，以实证的态度对待社会偏好。董志强 (2006) 曾提出应当承认考察经济行为的两种不同研究动机，一种动机是研究人们应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另一种动机是如何更好地解释

① 笔者在与国内一些经济学者私下交流中了解到一种看法：这些学者承认市场经济也是有问题和缺陷的，但他们主张不应过多地去谈论市场经济的问题；理由是，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谈论市场经济的问题有可能动摇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和信仰。这也是人的行为对社会信念作出适应性反应的例子。不过，对他们的看法，我不敢苟同：市场经济的好处不会因为人们明白它的问题而减少半分，反倒是把市场经济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可能使其遭遇“讳疾忌医”而病入膏肓。讨论市场经济的缺陷，正是为了建设更健康的市场经济。

和预测实际行为；^①前者未必需要考虑到伦理，后者却通常需要考虑道德伦理等社会动机，前者对应标准的经济理论（纯粹经济学），后者对应描述性经济理论（现在的行为经济学）。金迪斯（2021）应该也持有类似态度，但他似乎更强调“实证”的一面，即关注人们真实行为重视哪些道德原则。

第三，人的社会性对于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具有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洞见，限于篇幅本文不细论。关键的洞见是，人的社会性有可能导致纯粹经济激励失效或者偏离最优（即激励过度或激励不足）。^②特别值得提及的是Bowles（2016）的著作《道德经济》，它是鲍尔斯三十多年思考的结晶。在这本著作中他指出，仅仅靠经济激励措施和法律约束并不会产生繁荣的社会，有道德动机的“好人”必不可少；优秀的政策和原则不只是利用利己主义，也包括唤醒、培养和利用公德动机，因为人性可塑，合理的手段可使人性的光辉更加闪耀，政策也因此更加有效。

最后，我想引用一本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福斯菲尔德，2003：5—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问题的讨论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理论的功能之一是把事实有机地反映出来，但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实践，不仅要被大众接受，而且要被政治家接受。如果经济学要运用于实践，那么，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必须同步于那个时代的信仰、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且必须给出一个有利的结果。就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 埃里克森，罗伯特·C.，2016，《无需法律的秩序：相邻者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鲍尔斯，萨缪尔，2006，《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江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鲍尔斯，塞缪尔、赫伯特·金迪斯，2015，《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① 森（2016：762）也认为存在这两种动机。

② 更多详情可参阅董志强（2020）、鲍尔斯（2006）。此外，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2010）也涉及了大量相关内容。

- 鲍尔斯, 塞缪尔·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 2010, 《理解资本主义: 竞争、统制与变革》, 孟捷、赵准、徐华主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曹正汉、史晋川, 2008, 《中国民间社会的理: 对地方政府的非正式约束——一个法与理冲突的案例及其一般意义》,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道宾, 弗兰克, 2009, 《经济社会学的比较与历史分析方法》, 载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 罗教讲等译, 华夏出版社。
- 迪克西特, 阿维纳什, 2007, 《法律缺失与经济学: 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 郑江淮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董志强, 2001, 《关系、法律与经济效率》, 《经济评论》第5期。
- 董志强, 2006, 《纯粹利己主义反思与经济学方法论的二重性》, 《学术月刊》第8期。
- 董志强, 2008, 《制度及其演化的一般理论》, 《管理世界》第5期。
- 董志强, 2011, 《我们为何偏好公平: 一个演化视角的解释》, 《经济研究》第8期。
- 董志强, 2018, 《经济理论该如何回应行为“异象”挑战——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 《南方经济》第2期。
- 董志强, 2020, 《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 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经济思想》,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董志强, 2021, 《产权博弈: 演化与行为视角》, 《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 董志强、李伟成, 2019, 《禀赋效应和自然产权的演化: 一个主体基模型》, 《经济研究》第1期。
- 董志强、张永璟, 2016, 《禀赋效应与自发社会秩序: 一个行为经济理论》, 《世界经济》第10期。
- 福斯菲尔德, 丹尼尔·R., 2003, 《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 杨培雷、聂文星、吴琼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哈耶克, 弗里德利希·冯, 1997, 《自由秩序原理》(上), 邓正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金迪斯, 赫伯特, 2011, 《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部门行为科学的统一》, 董志强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金迪斯, 赫伯特, 2021, 《个体性与纠缠: 社会生活的道德与物质基础》, 朱起威等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金迪斯, 赫伯特、萨缪·鲍尔斯等, 2005,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 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金迪斯, 赫伯特、萨缪·鲍尔斯等, 2006,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郎咸平, 2018, 《马克思中观经济学(普及版): 拯救世界的经济学》, 东方出版社。
- 马克思, 2018, 《资本论》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 马歇尔, 阿弗里德, 2005, 《经济学原理》, 廉运杰译, 华夏出版社。
- 萨格登, 罗伯特, 2008,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方钦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森, 阿马蒂亚, 2016, 《理性行为》, 载史蒂文·N. 杜尔劳夫、劳伦斯·E. 布卢姆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6卷: N-R, 钱连源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 斯梅尔瑟, 尼尔, 1989, 《经济社会学》, 方明、折晓叶译, 华夏出版社。
- 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主编, 2009, 《经济社会学手册》, 罗教讲等译, 华夏出版社。
- 斯密, 亚当, 2018, 《道德情操论》, 罗卫东、张正萍选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梯若尔, 让, 2020, 《共同利益经济学》, 张昕竹等译, 商务印书馆。
- 图洛克, 戈登, 2017, 《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 范飞、刘琨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汪丁丁, 2011, 《行为经济学讲义: 演化论的视角》,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西蒙, 赫伯特·A., 2011, 《达尔文主义、利他主义和经济学》, 载库尔特·多普弗主编《经济学的演化基础》, 锁凌燕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叶航、陈叶烽、贾拥民, 2013, 《超越经济人: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业安, 2020, 《经济学正在寻求新的微观基础吗》, 《学术月刊》第12期。
- Acemoglu, Daron. 2010. “The Crisis of 2008: Structural 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s.” In *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Implications for a Post-Crisis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Spence, and Danny Leipziger, pp. 37 – 45.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 Ariely, Dan. 2009.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London: Harper Collins.
- Aumann, R. J. 1959. “Acceptable Points in General Cooperative n-Person Games.” In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 Volume IV*, edited by A. W. Tucker, and R. D. Luce, pp. 287 – 32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xelrod, Robert. 1980a. “Effective Choice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1): 3 – 25.
- Axelrod, Robert. 1980b. “More Effective Choice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3): 379 – 403.
- Basu, Kaushik, and Pham Hoang Van. 1998. “The Economics of Child Lab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412 – 427.
- Bhaskar, V., and Ichiro Obara. 2002. “Belief-Based Equilibria in the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with Private Monito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2 (1): 40 – 69.
- Bowles, Samuel. 2004. *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owles, Samuel. 2016.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92. "Power and Wealth in a Competitive Capitalist Econom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1 (4): 324 – 353.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2000. "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4): 1411 – 1439.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2004.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65 (1): 17 – 28.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2008. "Power."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ume 6*, edited by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pp. 565 – 569. Basingstoke/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Bowles, Samuel, and Sung-Ha Hwang. 2008. "Social Preferences and Public Economics: Mechanism Design when Social Preferences Depend on Incentiv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8 – 9): 1811 – 1820.
- Bowles, Samael, Christina Fong, Herbert Gintis, and Ugo Pagano. 2012. *The New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wles, Samuel, Richard Edwards, and Frank Roosevelt. 2005.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erer, Colin F., George Loewenstein, and Matthew Rabin (eds.). 2004.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arpenter, Jeffrey. 2010. "Social Preferences." In *Behaviou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dited by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pp. 247 – 252. Basingstok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ebreu, Gerard. 1974.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 (1): 15 – 21.
- Fehr, Ernst, and Klaus M. Schmidt.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3): 817 – 868.
- Fisher, Franklin M. 1983. *Disequilibrium Foundations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Cambridge/New York/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denberg, Drew, David Levine, and Eric Maskin. 1994. "The Folk Theorem with Imperfect Public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62 (5): 997 – 1039.
- Gintis, Herbert. 2003.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Altruism; Gene-culture Coevolution,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Norm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20 (4): 407 – 418.
- Gintis, Herbert. 2007. "The Evol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4 (1): 1 – 16.

- Gintis, Herbert. 2017. *Individuality and Entanglement: The Moral and Material Bases of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ntis, Herbert, Samuel Bowles, Robert Boyd, and Ernst Fehr (eds.). 2005. *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Th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Lif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 Heiner, Ronald A. 1983.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4): 560 – 595.
- Heiner, Ronald A. 1985. “Predictable Behavior: Repl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3): 579 – 585.
- Hirshleifer, Jack. 2001.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Conflict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rshleifer, Jack, Amihai Glazer, and David Hirshleifer. 2005.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Decisions, Markets,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UK/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bes, Thomas. 1949. *De Cive or the Citizen*, edited by Sterling P. Lamprech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 Huber, Joel, John W. Payne, and Christopher Puto. 1982. “Adding Asymmetrically Dominated Alternatives: Violations of Regularity and the Similarity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 (1): 90 – 98.
- Madi, Maria Alejandra. 2020. *The Dark Side of Nudge*. Abingdon, Oxon/New York, NY: Routledge.
- Mantel, Rolf R. 1974.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 (3): 348 – 353.
- Mantel, Rolf R. 1976. “Homothetic Preferences and Community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2 (2): 197 – 201.
- Piccione, Michele, and Ariel Rubinstein. 2007. “Equilibrium in the Jungle.” *The Economic Journal* 117 (7): 883 – 896.
- Rabin, Matthew. 1993.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5): 1281 – 1302.
- Simon, Herbert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1): 99 – 118.
- Simon, Herbert A. 1979.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 (4): 493 – 513.
- Smith, John Maynard. 1982.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New York/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nnenschein, Hugo. 1973. “Do Walras’ Identity and Continuity Characterize the Class of Community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 (4): 345 – 354.

Thaler, Richard H. , and Cass R. Sunstein.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Sociality of “Economic Man” : Reflections on Walrasian Paradigm Economics

Dong Zhi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Key Lab for Behavioral
Econo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sociality” of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combines contemporary thoughts and evidences from behavioral and evolutionary paradigm economics, and reflects on the Walrasian paradigm economic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man”. Sociality restricts individual rationality. This restric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individuals to deviate from the maximization of material benefits, thus it makes social cooperation order possible. If individuals are completely rational, the social order may be destroyed; a market economy composed entirely of “economic man” can not run well, or may fall into an inefficient equilibrium. The sociality of individuals makes it necessary for economics to shift from focusing on only the “market” dimension to the “market-government-society” three-dimens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from focusing on economic equilibrium to social equilibrium. To prevent social imbalances, the “inequality” that mainstream economics ignores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entral issues of the “market-government-society” three-dimensional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Economic Man, Social Preference, Behavior and Evolutionary Paradigm, Market Economy, Moral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B13, B25, B49, B52

(责任编辑: 倪诗妆)